

1979年 贺子珍坐轮椅秘访毛主席纪念馆！ 上

本文节选自《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——毛泽东与贺子珍》，作者：孔东梅

我开始理解沉默的外婆。她勇敢无畏、敢于开创的奋斗精神固然可敬，而追求独立的人格更是难得。这样一位女中豪杰的命运却如此不幸，是不能单纯用性格、脾气来解释的。如果她没有身负重伤，或弹片被及时有效地取出，外婆怎会离开外公？她的后半生，同时也是外公的后半生，都完全是另外一种活法。不过历史是没有如果的，外婆除了沉默，又能做什么呢？

曾几何时，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星——毛泽东与贺子珍，我的外公外婆。他们同生共死，度过



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。后来，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，从外公身旁消失了。外婆是西沉的弯月，外公是东升的旭日，再难相见。然而，月到半夜，日在中天，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。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，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，无奈为时已晚！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。

1979年，外婆想去北京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30年了。外公已与世长辞，他安

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馆中。朱德、陈毅、彭德怀，这些外婆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也已去世。物在人去，好不伤感。

然而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，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，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，没有改变。现在看来，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，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。外婆所坚持的，是一个老党员、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，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。

外婆一生中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都瑞金工作、生活过，长征之后在陕北的红都保安工作、生活过，还到苏联红都莫斯科留过学。如果在革命胜利后，却进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，显然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。

至于外公，人虽然已经不在，但从延安离别的42年——特别是庐山相会以来的20年间，他与外婆的精神联系早已超越了物质层次。能够到外

公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，对外婆来说，已经很满足了。

妈妈理解外婆，她知道外婆想来北京，想实现自己本应有的权利，想经常见到女儿和孙子孙女。只是外婆这样一位人物的行动，往往要惊动许多部门，妈妈必须各处落实。首先是外婆的住处。

70年代末，我们一家住在景山后面的部队大院。妈妈听说这里本要用作军委大楼，后来外公不同意，“挨批了”，就改为宿舍。这样的“军转民”建筑当然谈不上适用，实际上就是高级筒子楼。把需要卧床的外婆接到这里显然是不妥当的。

本来，妈妈是想让外婆到北京后住进像上海湖南路一样的“家”而非医院里。但是原来选定的地方一直住着别人，腾不出来。最后还是选定了解放军总医



院。

妈妈说：去解放军总医院安排外婆从华东医院转院事宜时，她遇到过冯文彬（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，外婆在红四军的战友）和叶剑英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）的弟弟，向他们谈起外婆来京一事，表达了外婆希望来京的心情。他们对此是支持的。中央的态度则是：外婆可以随时来往京、沪两地，想住多久住多久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我的爸爸——外婆非常满意的女婿“小孔”，为外婆来京一事默默做过大量工作。只是他已于1999年突然去世，同时带走了多少没来得及说的话。每当想到这里，我的心都会作痛。

1979年9月3日，也就是妈妈带我回京上学的第三天，中央派专机把外婆接到了北京。这个日子离9月9日外公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六天，离10月7



贺子珍和李敏夫妇在毛泽东像前